

## 【民族社会史】

### 近代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下降的文化因素

张敦福

人们对中国人口有史以来的不断增长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我国的主要少数民族蒙古族在近代却经历了四百年人口下降的经历。从下表可知，蒙古族人口十六世纪末期至 1949 年，人口总数减少了 255,000 人。谭惕吾也指出了民国二十四年之前“蒙人人口锐减”这一事实（谭，民国 24：77）。人口迁移使近代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由多数变为少数，对此学者的看法很一致<sup>1</sup>（Lucian W. Pye, 1975: 497; William Heaton, 1971: 13），而蒙古族人口绝对数的下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已有的文献中很少看到这一点。近代蒙古族人口的逐年下降，成为历史上一个奇特、值得研究的现象（见表 1）。

表 1、1949 年之前内蒙古的各民族的人口变动统计表

年 份	民 族						总 计
	汉族		蒙古族		其它少数民族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2 742 1000	1,000,000	57.1			750,000a	42.9	1,750,000
1570-1582	705,000	39.3	1,090,000	60.7			1,795,000
1800s 早期	1,000,000	46.5	1,030,000	47.9	120,000b	5.6	2,150,000
1912	1,550,948	64.5	828,977	34.5	23,254	1.0	2,403,179
1937 <sup>2</sup>	3,719,113	80.3	864,429	18.7	47,034	1.0	4,630,576
1949	5,154,000	84.8	835,000	13.7	92,000	1.5	6,081,000

注：a 匈奴、鲜卑和乌桓

b 1800 年后，主要是回族和满族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31、46、51、54、62。

在解释人口增长或下降的原因时，人们往往仅仅求助于生物的和经济的解释，如生产力状况、自然环境、食品的供应、技术发展水平等等。但是，文化因素，如不同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制度形态等都影响着人们对于生育和死亡、婚姻和家庭等的看法和行为，从

<sup>1</sup> 根据 Lucian W. Pye 的研究，1947 年内蒙自治区设立时，该区汉族与蒙古族的人口比例为 3/1，而到了 1971 年，这一比例上升为 15/1；William Heaton 用汉族人口迁入的绝对数说明了同一事实，他认为，1969~1970 年间来自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汉族移民超过一百万人。

<sup>2</sup> 1936 年前，察哈尔、绥远两省共有 4,469,800 余人，其中蒙民人口最高不过 35 万左右，占全体人口的 8% 弱（谭惕吾：93、94）。



而影响人口的增长或下降<sup>1</sup>。忽略了文化因素，任何民族和社会人口的变动都是难以理解和解释的。笔者认为，十六世纪末至1949年间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的下降，蒙古族文化及其变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喇嘛教的流行、盟旗制度的建立和统治者在蒙古族中大量征兵。

## 一、喇嘛教的传入、流行及其特征。

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又称黄教，其教义主张灵魂不灭，劝说人独善其身，虔修来世；教诲众徒凡能在世上积累功德者，死后灵魂即可升往西天极乐世界，再转世后即得大富大贵；人生苦短，乐少悲多，生老病死等苦痛均不可避免，因而应当抛却现世、专注幻想来世。早在元朝建立之初，忽必烈就受八思巴喇嘛的诱导而虔信佛教，元朝创建（1260年）后，忽必烈即立八思巴喇嘛为国师，圆寂之后又封为帝师<sup>2</sup>。明代阿勒坦的彻底皈依和三世达赖喇嘛的宣教，使得蒙古人传统的萨满教被禁绝，蒙古人上自可汗、下至百姓，甚至连敌对的卫拉特和遥远的布里雅特两族，也随之而改宗信佛（札奇斯钦：132、134）。蒙古族世代生活的地带多已成为穷荒大漠，所受风日交侵之苦尤多，耳目声色之娱甚少，这种情形之下，极易感到人世的悲凉。在游牧社会中，与一般平民生活实际有直接关系的，不是文字，而是关于畜牧的常识和经验。所以，读书识字受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蒙民是文盲，很容易迷信。喇嘛教既给以来世幸福的允诺，其教义又如此贴近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因而在蒙古族人中很快深入人心，很快在内蒙古地区流行起来。

喇嘛的社会经济地位很高。普通蒙古族人住处多为极其简陋的蒙古包，而喇嘛庙的建筑往往富丽堂皇，甚至远非内地寺庙所能企及<sup>3</sup>。喇嘛由政府养活，按所属行政隶属关系由各旗出经费作为喇嘛的俸银，数额多少主要取决于各旗的经济状况。1892年，多伦诺尔锡拉苏默有四百喇嘛，呼和苏默有五百喇嘛，当地寺庙1878年的簿籍记载了各旗喇嘛的年俸：三音诺颜部的喀尔喀旗给每个喇嘛的年俸多达六十二两银子；南部各旗给每个喇嘛六十两银子，太仆寺旗是五十六两，喀拉沁某旗为三十四至三十八两；此外，派有喇嘛住在多伦诺尔寺庙的各旗还必须为自己的喇嘛供给一座独院的板升（房屋或僧舍）作为住所（阿·马·波兹德涅耶夫：352~356）。

人们对喇嘛教的迷信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蒙古族人对于活佛视若天神，一般蒙人如此，即便王公家族成员见到活佛，也跪拜尽礼。活佛每到一处诵经，无论王公平民必须往观并致奠礼，

<sup>1</sup> 关于文化因素对人口变动的影响，见 E. T. Hiller, "A Cultur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ends"; Frank Lorimer, "Culture and Human Fertility: Conclusions"; Edward N. Palmer, "Culture Contacts and Population Growth"; William F. Ogburn, "On Social Aspects of Population Changes." in *Population Theory and Policy* edited by Joseph J. Spengl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The Free Press, 1956) .

<sup>2</sup> 沙俄时代蒙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曾受命在1892年6月~1893年10月来我国蒙古地区搜集资料和实地考察。在从多伦诺尔到经棚的路上克什克腾旗境内，波兹德涅耶夫在发现了树立于1325年的元代石碑。石碑上有如下记载：元丁亥年（1287年），忽必烈汗亲自率领大军征讨叛逆。他驻军应昌的那天晚上，有一尊佛如幻影似地从空中飞过，现出他的金身。这一征兆被解释为，忽必烈能转天动地，能够摧毁坚不可拔的堡垒。梵王和帝释总是伴随着他，保护着他；如来的出现则是胜利的前兆。皇姊大长公主即命令撰写颂诗，并将其刻在石碑上。诗云：“如来佛显示他那金色的法身，他的现相本是无因。皇帝忽必烈英武盖世，似如来佛一转眼就把群魔降服……”诗句和记述把忽必烈的武功政绩和如来佛现身神秘的联系为一体，可见当时蒙古族上层社会是怎样迷信佛教的（波兹德涅耶夫：386~392）。

<sup>3</sup> 十九世纪末仍然可见喇嘛庙的繁盛景况，尽管当时喇嘛教已渐趋衰微。（有关论述详见波兹德涅耶夫：248，258~264。）



其数目自一元至数百千万元不等；活佛随从人员每日肉面黄油一斤，牛奶一罐，蜡烛二支；而每一活佛随从人员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勾留日期自数日至数十日不等，因而蒙民中有“僧债”的说法（谭：112、113）。班禅前往锡盟宣化时，竟不惜巨资建造一座大庙，经费皆由蒙民分担。喇嘛庙礼拜时节，无论王公平民、男女老幼，摩肩接踵争相前往，稍富有者常常不顾千里、顿首伏拜，前往西藏拉萨或山西五台山礼拜。上述种种均加剧了内蒙古地区的贫困（谭：113；札奇斯钦，1986：144）。蒙人不信医药，凡有疾病，必请喇嘛祈祷（这种价值观念造成人口总体上健康水平下降、平均寿命短、死亡率高、婴儿成活率低，最终导致人口减少）；婚丧嫁娶亦请喇嘛诵经，每家必贴咒文于门前，每个蒙古包内必设佛坛以供礼拜，喇嘛几乎成了蒙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角。

蒙古自1570年代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近四百年间，由于虔信喇嘛教，在生活、文化、经济、甚至政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寺院几乎成了社交活动、经济交往和文化教育的中心（札奇斯钦：137~138）。喇嘛在蒙民中甚至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因信仰和制度上的许可得以免去一切对俗世政权的税负和徭役，平日不事生产反而受人供奉；出则受人尊敬和欢迎，无论到任何一个蒙古包，略诵佛经即可满载而归；喇嘛中上层“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的地位更是优越，就是王公贵族等世俗领袖，为了顾及今生来世的关系，也丝毫不敢得罪（谭：113；札奇斯钦：144）。草原大漠之中，普通蒙民的居民点极其分散，往往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即便在一个居民点的牧户，前后左右也很少有邻居。因而日常生活相当寂寞。而人口集中的寺院生活则比较丰富多采。蒙古族男子一旦为喇嘛，只须手持念珠、口宣佛号，不仅西方乐土恍然如在眼前，当前生活条件优裕，远不象一般蒙人那样为生计困苦奔波，这种生活何乐而不为，因而蒙古族人以当喇嘛为一生的荣幸，“凡有优秀子弟，其父兄则令其为喇嘛，如兄弟二人，至少以一人当喇嘛，故喇嘛之数目几占蒙人男子之半数……喇嘛庙在内蒙各地，最小之旗，亦有十数座以上。大者有喇嘛数千人，少者亦有数十或数百。”（谭：112）“甚至也有人把独生子送入寺院”（札奇斯钦：138）。因而，甘为喇嘛的蒙古族男子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根据1934年的统计，绥远省有蒙古族224,522人，而挂名当喇嘛的有27,203人，占人口总数的12.12%（《中国人口》：58）。

蒙人迷信喇嘛教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一，男子出家入寺做喇嘛的年龄均在十岁左右（札奇斯钦：140），在他的生育年龄（十四岁以上）依照喇嘛教教规即被禁止结婚，凡当喇嘛者，皆无后代，遂造成人口减退；其二，凡当喇嘛者皆不事生产，徒增消费，蒙民为信教而把生产剩余所得奉献给寺院，使得民间因剩余生产力的下降而无法投入于再生产，故蒙民生计日趋窘迫，反过来束缚人口的再生产。

## 二、盟旗制度的影响

满清统治者在政治上确实才华很高，它以少数民族中的少数，统治了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疆域辽阔的中国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它对待辖下的各族，各有一套独特的施政办法使他们臣服并感到相当的满足。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里，蒙古族由称霸塞北的地位，变成一个衰弱不堪、人口锐减、几乎趋于灭亡的民族则是事实（札奇斯钦，1986：203）。

满清统治者似乎很了解，游牧民族的力量来自于他们能够机动。动就能使他们象滚雪球一样形成势若千钧的声威和战斗力。满清政府统治蒙古的着眼点，就是把他们分散成碎块，并牢固



地限制在一块小的面积之上，使他们不能动，不能再联合。这就是满清统治者给蒙古人制定的盟旗制度的由来（札奇斯钦，1987：318~325）。

清政府对蒙古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就是根据蒙古部族的历史背景，依照满族人的社会组织制度，把内蒙古划分为四十九个旗，再把旗很松散地置于行政力量非常薄弱的盟长的监督之下。每一个旗均有它自己的“游牧地”——该旗所辖有的公共牧场，旗内人民，不论王公、贵族或平民，均不得越界游牧和狩猎。私越旗界者都应受到严重处罚。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各旗的封地，实际上是防范蒙民之间的串联和团结（谭：42）。在旗之下又分成若干苏木。由中央机构理藩院统辖盟旗事务<sup>1</sup>。

盟旗制度差不多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满清统治者设计的蓝图是，在蒙古传统的人与人的封建关系之上，再强调人与地的关系。使每一个旗都成为行使封建自治的行政及军事单位。这种分化政策，使得盟与盟之间、旗与旗之间横的联系减少，而中央与地方，尤其是中央与旗之间的纵的联系加强。

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军事都是以游牧和狩猎为基础的。他们为了繁殖家畜，不惜作远程的巡回，而经常移动。游牧、繁殖家畜，既然是蒙古族赖以生命线的，蒙古皇族自然十分看重游牧和狩猎（札奇斯钦：1986：62）。蒙古地方父老口碑承传说：成吉思汗曾经说过，“有一天我的子嗣们放弃了自在的游牧生活，而住进用污泥造成的房屋，那就是蒙古人的末日了！”<sup>2</sup>这虽是民间的传说，也可以显示出蒙古人对游牧生活的爱好和对定居农业生活的厌烦。在草原牧区，牧者的定居生活容易造成周围生态环境的退化（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2: 188~198）。盟旗制度固定下来后，蒙民长期固定在一个旗范围内放牧，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草场的退化和沙化；而蒙民靠天养牧、粗放经营的传统习惯很少改变，加上生产技术的限制，还不能象今天这样进行人工培育草种、更新和建设草原。由于男子当喇嘛或充军，生产和经营缺乏精壮能干的劳动力；余下牧民的生产剩余还要交往寺院，资金和劳动力有效投入的缺乏遂造成牧业的衰退。牧业又不象农业那样只须较少的耕地就能维持生存<sup>3</sup>。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各盟旗人口遂逐渐减少<sup>4</sup>。

### 三、善骑射的传统与征兵

就军人素质而言，蒙古族是上选。勇毅是蒙古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札奇斯钦，1986：61）。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即是依靠其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的优势而打天下、治天下，成为蒙古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元亡之后，农业朝廷不能克制蒙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蒙古人的善战和进退自如的机动性，另一方面限于地理条件，汉族农民出身的兵力不能控制广漠的瀚海和草原。清政府政治上的成功，部分得益于蒙古人的武力：击败准噶尔叛乱的一半战斗是蒙古军打的；僧

<sup>1</sup> 理藩院是清朝司理藩属事务的机构，主要对象是内、外蒙古、西藏和新疆，还有部分涉外事宜。清末改为理藩部，涉外事宜归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主旨，取消理藩字样，改为蒙藏院。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蒙藏委员会。

<sup>2</sup> 这是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的传说。

<sup>3</sup> 一般来说，在内蒙古平均每人5~10亩耕地即可维持生存，而在牧区则要人均占有草场1000亩左右。

<sup>4</sup> 伊克昭盟在清初有206,500人，1937年下降到93,120人；锡林郭勒盟在清初有86,250人，到1937年下降到39,588人（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解剖》，第5页）；新巴尔虎旗解放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6%，婴儿死亡率高达29.5%（内蒙古医学院编，《内蒙古人口的发展和预测》，第8页）。





格林沁率领的蒙古“勤王军”与英法联军、太平军和捻军进行了强有力的周旋，使已衰的清廷得以延续残喘（札奇斯钦，1986：219、220）。

勇敢善战的优势还通过以学校教育和社区生活等社会化过程得到强化。旗，实际上是军政合一的组织，蒙民壮丁都是天然的民兵（谭：101）。按照蒙古族的历史传统，善射者和大力士往往受人尊敬。而骑射、摔跤或角力，都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的。游牧和狩猎生活离不开骑术，牧民日常生产和交往中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骑马、射箭、摔跤和比武。即便现代学校教育引进内蒙之后，一般为人所重视的，仍是赛马、角力和射术，因为这些东西对蒙古族人来说既是生活技能，也是战斗技能。

蒙古兵（尤其是骑兵）的骁勇善战，是满清政府在蒙古族中大量征兵的首要原因，也是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清初，就一次从蒙古族中征兵 18,843 名（《中国人口》，58）。蒙古男子被征调的人口比例远高于汉族，他们部分战死疆场，部分长期驻防在外，这就减少了本地的蒙古族人口。

####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喇嘛教的流行、盟旗制度的建立、统治者在蒙民中大量征兵等文化因素是如何造成近代蒙古族人口下降的。它使我们在经济和生物学的领域之外，找到了更有助于理解这一独特现象的解释。这些因素的目前状况如何？对内蒙古地区的人口现象起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则有待于社会学、人口学者给予回答。

（张敦福，1965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博士候选人）

#### 参考文献：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郑德林、卢龙、孟苏荣、刘汉明译，1983，《蒙古及蒙古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Lucian W. Pye, “China: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1975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Grassland and Grassland Sciences in North China*,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 C. 1992.

William Heaton, “Inner Mongolia: Aftermath of the Revolution,” *Current Science*, 9.9 April 1971.

谭惕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内蒙之今昔》，上海商务印书馆。

《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札奇斯钦，1986，《蒙古文化概说》，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札奇斯钦，1987，《蒙古文化与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